

——习近平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余村十八年



图为风景秀美的安吉余村。

第一视点

开篇的话：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和系统思考谋划，擘画并实施了“八八战略”这一省域发展全面规划和顶层设计，引领浙江开启伟大变革之路。20年来，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久久为功，锲而不舍，浙江实现精彩蝶变。本报今起开设《第一视点》专栏，循迹溯源，深入讲好习近平总书记的故事，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呈现浙江贯彻“八八战略”的生动实践，激励全省干部群众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道路，在推进共同富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奋力打造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征途上奋楫前行。专栏开篇推出长篇蹲点报道《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余村十八年》，忠实记录安吉余村探索绿色发展之路的故事，生动展现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真理伟力。

余村，4.86平方公里的村域面积，在960万平方公里国土之上，实在微不足道。在浙江1.9万个村中，她也是普通的一员。但余村却又是中国发展历史中，不平凡的存在。

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入村调研，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刻阐释了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辩证统一的关系。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再访时指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已经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和行动，成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十八年来，这一理念指引着余村蝶变——仿佛是一种巧合：余村本就有座山，名为青山，藏着金矿，只不过成色太差，村里“开青山、挖金矿”的路没走通。

但是，真理伟力让余村圆了梦。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道路，上下求索，余村的环境在变、产业结构在变、人的命运也在变，青山真的成了金山！

小小村庄，恰是浙江生态文明建设的缩影，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浪潮中的一朵夺目的浪花。

在首个全国生态日前夕，我们深入余村蹲点一个月，回望其走过的路，从一次次徘徊路口、一次次坚定方向的探索历程中，看到一个村庄的巨变，也感悟到真理指引之下一个国家的选择、一个民族的希望。

（一）山茫茫，前路何处寻

秀丽的天目山脉，蜿蜒西南，其间孕育了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良渚文化；延伸东北，余脉收尾处就在湖州市安吉县的余村。

故事从这里开始。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中国经济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处于高速发展阶段的浙江率先感受到“成长的烦恼”，日益突出的环境污染问题成为症结所在。

1996年，国务院向江苏、浙江、上海下达了限期治理太湖流域水污染任务；次年，“零点行动”方案确立，要求至1999年1月1日零点，太湖流域工业企业污水必须达标排放。其后，国家环保政策越来越严。

2002年，习近平同志来到浙江就特别重视生态环境保护。他在主持省委十一届二次全会时提出，积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以建设“绿色浙江”为目标，以建设生态省为主要载体，努力保持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不久后，习近平同志提出实施“八八战略”，其中一条就是“进一步发挥浙江的生态优势，创建生态省，打造‘绿色浙江’”。

时代潮涌推动之江大地的巨变，涟漪泛进了小小的村庄。那是2003年夏天的一个早上。

狭小的村委会会议室，里一圈外一圈挤着20多个人，村民代表会议正在召开。大家的脸色半明半暗，有人愤慨，有人疲惫，有人惆怅。

议题大家心知肚明：关于一个水泥厂和三座矿山的去留。这件事不知道被拿出来讨论了多少遍，却总是没个定论。

改革开放以来，全社会跳动着发展经济的欢快音符，中国进入创富好时节。穷到做梦都梦见“地上泥变成米”的余村人，发现家门口的山石是天然建材。石头烧成灰，能做砖头、水泥。

一时间，靠着石头，村民富了，余村也从“贫困村”变成“富裕村”。村民终于喝上了自来水，接上了电话线，还竖起了全县第一口卫星电视“大铁锅”。

但是青山秃了，绿水黑了，漫天开出的都是黑白渐层的“烟雾玫瑰”，成片的竹林浸染的是枯草的黄，路上的人从身上到脸

上都灰扑扑的……

谁不知道绿色好！但厂子要是关了，老百姓怎么办？一年几百万元的村集体收入，岂不“啪”一下没了？蒸蒸日上生活还能维系吗？

“整个浙江都在讲生态、讲绿色，我们村哪里沾得上边？”村党支部书记鲍新民脸型瘦削，一副书生面相，但语气坚决。

他站起身，攥紧的拳头抵在桌上，犀利的目光扫过全场，“今天必须把问题解决！”

推动余村改变的不仅是时代的浪潮，还有那无法回避的切肤之痛。

“富裕村”余村的另一个别名，叫“残疾村”。每天，矿上大大小小炸几百炮。山下老人是无法安享晚年的。他们的心，半颗牵牵上上班的儿女，半颗挂着好动想跑出去玩耍的孙儿。

炸飞的石头，从来不长眼。压断了腿的，撞断了手的，还有被炸山炸死的、被石头压死的……噩耗隔三差五传来。

比石头更难躲的是石灰。它溜进鼻腔和咽喉，滑过气管，直抵肺部。人们刚开始不觉，后来会咳嗽、咯血、呼吸困难。诊断书上三个字：尘肺病。医生解释：石灰一层层黏在气管和肺里，遇到水汽，就凝固成了水泥，肺里灌了水泥可不得把人憋死？人们大惊失色，大把的钱搬进医院。

“要钱还是要命？”村委会主任胡加仁接过话，抬起胳膊，蜈蚣一样的疤痕格外扎眼。这是被炸飞的矿石划伤的。

心一横、脚一跺，大家终于决定：当年关停水泥厂；2005年，矿山承包一到期就关停。

厂关停了，然后呢？学着隔壁村搞搞小饭馆？仗着竹林搞竹制品工厂？还是出去打工？

会议在一个个“问号”中散场。不过，村干部还是得挨家挨户传达决定，动员村民另谋生路，告诉他们方法总比困难多，告诉他们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那些日子，村干部得到了不少支持和肯定。但是，不理解、不支持的村民也不在少数，有村民还拿着碗筷在村委会办公楼前敲得“咣当咣当”响……当然，更多时候，他们面对的是那双眼睛，闪烁着无助、迷茫、期待……

一个最直观的数据：2004年，村集体收入从300万元直线下滑至20万元。

好几次，胡加仁都会去村里那棵百年老银杏树下，看着枝丫上新发的嫩芽，默默地发问：你说我们的路到底怎么走啊？发展的道路，从来都不是笔直的。人类在历史的每一个关键时刻，常会站上十字路口。

银杏树不会作答。

勇敢的探路人，需要一束能击破迷雾的光。

（二）一席话，顿使天地宽

又是一个夏日。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到余村调研民主法治村建设。

就在两年前开村民代表会议的那个会议室里，习近平同志问得多，村干部答得也多。话题很自然地转到了生态保护上。

面对省委书记，鲍新民有些紧张，一紧张，普通话就更说不好，干脆脱稿。“我们通过民主决策，关了矿山和污染企业。”汇报到这里，他的声音低了下去，底气不足。

在那个习惯把GDP作为判定工作好坏标准的时期，到底该走怎样的发展道路，发展又是为了什么？寻求这些问题答案的，不只是余村，更是整个浙江，甚至整个中国……

“你们关矿停厂，是高明之举！”习近平同志面带笑容，果断明了地说，“过去我们讲既要绿

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其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本身，它含有含金量。”

他还讲了一个新鲜词——“逆城市化”。“安吉是宝地，离上海、苏州和杭州，都只有一两个小时的车程。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逆城市化现象就会更加明显，一定要抓好度假旅游这件事。”

这就是那束击破迷雾的光啊！一字一句，口口相传，进了村民的耳朵。

一则以喜——

“省里领导说我们‘靠山关得对！’

“还说绿水青山是宝贝，能变金山银山。”

一则以疑——

“城里人真愿意来村里吗？”

此时，绿色的种子已然埋进余村人的心里。

但走通这条路并不容易。

矿关了，但生态还没完全恢复。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首先得让村庄变美——

曾被运输车碾得坑坑洼洼的村道修整一新；因挖矿被破坏的山体得到生态修复；曾经枯黄的竹林长出新笋，成了林业观光园区……

与生态环境整治同步，村民也自发开始了对生态产业的探索。

“唔，你们听听，省委书记都说度假旅游好，我就不信我干不成！”潘春林食指敲得木头桌子梆梆响。

不到一米七的个子，薄薄的身板，眼里迸出亮光。从身材长相到经商头脑，他都是个典型的浙江汉子。矿山关停后，他拒绝堂哥合伙开竹制品加工厂的邀请，和妻子掏出60万元家底，又向银行贷了一大笔钱，开出农家乐——春林山庄。

“逆城市化”。这四个字，潘春林牢牢记住了。

2005年9月开始，每隔一段时间他就去上海“开源”，专跑中高档小区、老年人多的广场，分发自己制作的传单，一去就是三四天。

一天，发完传单的潘春林回到旅馆房间歇歇脚。桌子上放了上海畅销的《新民晚报》，一整版的分类广告黏住了他的目光。招工、招商的，大大小小、密密麻麻，像极了丰收的水稻田。

按着提示，他打去电话：“喂，我想做广告……600元一期吗……好，我买买！”

大概3年时间，《新民晚报》上，不定期会出现一块“豆腐干”——只有简单几个信息：春林山庄，每人100元，3天2晚，包吃包住，电话xxx。每次广告至少能招来大半个月的客源。

余村里，这“山庄”、那“山庄”，像春笋一样往外冒，吸引城里人来吃农家饭、摘农家果、捞农家鱼、戏农家水，体验一把“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

绿水青山回来了，人来了，人住多了，金山银山也有眉目了。真理之光照亮余村，人们越来越深切地体会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真正含义，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不是矛盾对立的关系，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把生态保护好，生态就会有所回馈，更加坚定地走上了绿色发展之路。

如今，整个中国开辟了一条又一条由“绿水青山”通向“金山银山”的大道——

同在安吉的鲁家村，将闲置山林等生态资源变为资本，入股进村项目，撬动了数亿元社会投资；

浙江遂昌大田村，发布了全国首份村级GEP（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报告，让生态产品有了清晰价格；

内蒙古大兴安岭的北岸林场，围绕“林”字做活“绿文章”，发展森林旅游，实现了“不砍树照样能致富”；

福建三明常口村，生态公益林可折算成碳减排量进行交易，村民不砍一棵树，靠卖碳票就能挣到钱；

……

思路一变天地宽。以余村为起点，“点绿成金”的新奇迹在全国各个角落上演。

（三）日日行，骐骥终一跃

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指引下，余村的美丽画卷徐徐展开。但时代总是给探路人提出新要求，余村人的认识还在不断深化，路径还在不断升级，把绿水青山建得更美，把金山银山做得更大。

2008年，安吉吹响“中国美丽乡村”建设号角。前行中的余村，却遇到了难处。

首先，是人的问题。村两委班子青黄不接，更别说“杀出一条血路”。5名村干部，最年轻的潘文革也快50岁了，急需注入视野更开阔、精力更旺盛的年轻血液。

他们招回了俞小平等一批年轻人，有的加入村两委班子，有的回村创业。

我们第一眼见到俞小平，就觉得像六小龄童。了解他的人说：小平猴精，能说会道。他在余村矿上当过会计，后来闯荡金华、宁波，干过财会工作，也做过电脑生意，是见过世面的人。

说起当村干部这事，他还有些难为情，当时他更想在外边挣钱，是镇上干部硬生生把他拽回来的。

当年，天荒坪镇党委副书记朱来麟抓着俞小平的手说：“一个月算3000元，十年能赚36万元。余村一共36名党员，每人给你投了一票，你觉得36个人的信任值不值36万元？我知道，余村的工作不好干。这样吧，你实在想赚钱不想回村，下次党员大会自己表个态，让大家不要投你。”

最终，俞小平硬着头皮做了这个没有让他后悔的决定。

其次，是钱的问题。村集体经济收入断崖式下滑，可是保洁要钱、冷水洞矿坑除险加固要钱、修补从中心村到矿山的破损村道要钱，有去项，没进项，账户里的钱像水一样“哗哗”流走。余村没“余粮”了。

幸好村里盘来盘去，还有些家底。腾出了老校舍、老厂房、老村委会办公楼，拆掉了鞋厂、羽绒厂、服装厂，靠着物业出租和工业用地指标置换，村集体经济年收入重新回到200余万元水平。

最重要的是，乡村产业结构如何与时俱进？

关矿后，竹制品加工产业被视作“生态工业”，与农家乐相伴而生。但剖竹子、洗竹筷，还是会产生粉尘和污水；晾晒竹丝，多多少少影响村容村貌。

2013年，随着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浙江掀起新一轮生态环境综合整治潮，“五水共治”和“三改一拆”拉开序幕，势如破竹，倒逼产业结构转型。

“赵哥，来，先抽根烟！”一簇火苗凑了上来。

“唉，你让我再想想……”猩红的烟头烧出焦灼的气氛。

“总书记当年说，我们这里是块宝地。这两年生态好了，游客多了，晚上广场放电影，城里人和我们坐一起看。把厂拆了以后，环境更好，人不是会更多？这是机遇啊！”

点烟的人，正是俞小平。抽烟的人，名叫赵水根，同龄人还在水泥厂、矿场干活时，他早早办起竹制品加工厂——山上砍来毛竹，剖成竹丝或圆棒，清洗晾晒后制作竹筷竹席，每年净利润足有30万元！

他知道，俞小平是来做思想工作的。前两日，他突然接到了一封通知书：工厂即日关停。

这些无力转型的家庭作坊、规模不大的工厂，村里是彻底清退，还是给它们留条后路？

这一幕何其相似，老村委会办公楼里的“矿山关停之争”历历在目。

“要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有所得有所失。”习近平同志当年的嘱咐，敲得他们的心“咚咚”直响。

这一次余村没有犹豫，更加坚定地发展绿色产业。

（下转第二版）